

忻平
著

全息史观与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Quanxi Shiguan
Yu Jindai Chengshi Shehui Shenghuo



復旦大學出版社

全息史观

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Quanxi Shiguan

Yu Jindai Chengshi Shehui Shenghuo

忻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 忻平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309-06476-6

I. 全… II. 忻…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0303 号

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

忻 平 著

出版发行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388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9 - 06476 - 6 / K · 248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本研究受上海大学“211 工程”第三期项目“转型期中国的民间文化生态”(A.15-A011-09-001)的资助。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危机中的繁荣：1929—1933 年上海市民社会生活研究”(09YJA77040)的资助。谨致谢意。

Supported by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of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Project Number: J50106

史学理论与方法

余思社会史观：一种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3
论王韬的史著及其史学理论	13
治史须重考据，科学人文并重	19
——南洋利通老臣鲜何炳棣教授传记	25
时代的变迁与党史研究的拓展	31

中国现代化之路

论辛亥革命：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与加速器	39
儒家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48
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66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78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	85
——透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帮会与社会边缘化现象	92
论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阶层的尚武意识	103
民国时期农村现代化之一例：20 世纪 20—30 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114
论新县制	126
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	149

序

夏东元

忻平教授的新著《全息史观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国庆六十周年大庆刚刚过去,改革开放 30 年给中国带来了大变化。“文革”的结束给当时的年轻人上大学造就了机会,忻平就是其中之一,一晃 30 年过去了。忻平在学史 30 周年之际,选出了 30 篇论文编成此书,颇有意义。翻阅着厚可盈尺的书稿,我甚感欣慰。作者向我索序,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忻平中学毕业后,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不发展生产力,城市无法容纳新增的劳动人口,因此那个年代的中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的名义统统下乡当农民。作为下乡“知青”,他曾在安徽滁州市来安县农村历练了多年。在农村,他学会了当农民必备的十八般武艺,直面当时中国农村现状,这对他以后学习中国历史是十分有益的。1978 年恢复高考后忻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 年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数年后他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我建议他不断开拓感兴趣的新的研究领域。他提出希望以现代化和社会史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我十分支持。三年后,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以其博士论文为主体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 1996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一些高校还将此书列为研究生参考教材。

治学上,我一贯提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甘心寂寞,不凑热闹”的理念,并强调历史不是单一的,是相互联系的,忻平的认识和我颇为一致。忻平从事史学研究 30 年来,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即以全息史为史观,社会史为方法,以现代化为关照,强调近现代历史的整体性和关联性。20 世纪 90 年代忻平相继指导硕博研究生以来,重视治学与做人的一致性,强调为学须视野开阔、低调扎实、欲治学先做人,在学术上培养学生的全息史观的大视野和社会史方法。这种理念我是赞成的。

忻平教授具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专业兴趣,治学勤奋刻苦。他作博士

论文时，先后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收集资料，做了大量的记录卡片。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他经常带着干粮和一壶水，骑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寒风赴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他长期扑在图书馆，中午图书馆休息时，经常让管理员把他关在里面看书；同时勤于思考和动笔。近些年来，忻平先后出版了《王韬评传》、《民国社会大观》、《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和《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等学术专著多部，在《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和《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本书正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忻平治史30载的学术成果。而且他兴趣广泛、涉猎面广。从本书选文不难看出，忻平的研究兴趣点颇多，从历史出发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等多个学科。这为他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通览全书，我觉得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研究方法值得称道。我常言研究历史要立得足够高，沉得足够低，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这些在本书中均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理论兴趣激发了理论创新，在其专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中首倡全息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一种全息运动，全息体和全息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此我们“必须全面、立体的而非片段、平面的研究‘整体历史’，才能真正从整体上‘再现过去’”（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并以此论贯穿全书。

二是本书通篇所体现的是一种平实质朴的文风。好的史学著述一定要有好的表现形式，一个好的史学家，必须有一定的综合素养，这也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忻平认为史著须还原历史的真实，应体现历史的规律和特点，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从中体现出理论的魅力，闪烁智慧的火花。“文以载道”，直抒胸臆，体现哲理性的同时，书文首先必须要有可读性，故他的书文笔清新细腻，平实质朴，可读性强，读之有如饮甘泉。说实在话，我颇为推崇忻平这种文风，希望他继续将之发扬光大，为学界添一新风。

三是本书选择的30篇论文，是忻平若干本专著和百篇论文的学术精华，可以说是他治学30余载的代表作。本书选文依据思考角度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大致分四类：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化之路，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和宗教，加上附录即为他的博士生著作所作的若干序文共五个部分，基本展示了忻平这30年来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关注点和学术轨迹。

第一部分是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理论和方法探索中，《全息社会史观：一种新史学方法的探索》一文

是忻平最有创造性的工作，其中的全息社会史观，是他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的，这种方法的应用，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性论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中；《论王韬的史著及其史学理论》揭示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王韬进化史观与史学思想的创新，发掘了其兼跨东西方和上下古今的治史方法；《治史须重考据 科学人文并重》系忻平对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的访谈，既介绍了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对中国史研究的深刻认识和贡献，也体现了作为汉学家的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入思考；《时代的变迁与党史研究的拓展》则体现了忻平研究领域的新拓展，面对变化着的时代，他提出了对党史研究应加强社会史方法运用，提出从课题到方法都应进一步深入改革和拓展的观点。

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思想活跃，由此产生了“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争。忻平依据时代变迁和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积极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提出了全新的全息史观，不仅阐明了他主张的一定条件下方法论即体现了史观的观点，还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所谓的研究范式之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这也反映了史学研究者的自觉意识和开拓精神。

第二部分是中国现代化之路。

《甲午战争：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与加速器》一文，论述了甲午战争的灾难导致了全方位地开启了中国大门，全面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将中国纳入到世界体系和“与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依赖中去”，却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与加速发展启动了倍增器，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清末新政不仅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并为辛亥革命后中国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从孙中山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眼，考察了他倡导的中国现代化具有全方位对外开放、与时俱进、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等特点；《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则阐述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坐标，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重心与布局，既暴露了国民党模式的根本弊病，也孕育并催熟了现代化的多元模式，形成了多元势差结构，并最终使现代化模式之争从多元复归一元；《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则从一个视角透视了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社会大转型期上海帮会“适时而变”的特点；《论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阶层的尚武意识》探索了 20 世纪初新知识阶层在内外诸种因素影响下一改传统的重文轻武观念和文弱形象，而形成了一种改造社会的新理念——尚武意

识，并论及这种意识既导致了以后军阀混战的民国社会态势，也推动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武装革命高潮的出现；《民国时期农村现代化一例：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论证了国民党政权定鼎南京后，为推动农村现代化曾极力推行农村合作运动，促进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论新县制》从另一个角度通过对新县制的全面考察，探讨了国民政府后十年为改变“政令不出都门”的现象而探索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及其相互关系；《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分析了南京政权现代化机制中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特征，揭示了南京政府由“倡导近代化”到反对“近代化”而陷入“二律背反”，从而导致了其必然的崩溃。

社会变迁是中国近代史的总体特征，近代史的诸多理论都以此为核心。在纷繁芜杂的社会变迁中，现代化一直是重要主线和潮流。对于作者这一代学人来说，现代化研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大课题。本书选出的这几篇文章就反映了作者立足于现代化的最前沿——上海，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思考。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30年来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改革开放大潮引发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也导致了史学视野、角度和理论的转型，因此，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重大主题的关注无疑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热潮。然而现代化进程的前提自然是革命进程。因此，及至1949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各方面无不与革命进程息息相关。据我所知，忻平在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题的现代化进程时，曾列出12个专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重要领域，其间，主要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外部背景和内部机制的变化、社会与经济转型的各种表现以及重要人物所带来的重大变迁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变化的同时，也继续注重诸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甲午战争、清末新政、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中的发展时段。不难发现，作者在关注和研究革命进程的同时，也展现了其现代关注和“现代阐释”。

第三部分是社会生活史。《梦想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现实观与未来观》一文，直白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不满，揭示了他们对现实中国诅咒的“破碎的梦”及“无语”乃至“无梦时代”等不同观念，展现了中国社会各层面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各自的政治观点、道德伦理、生活理念，尤其是通过对未来中国的“强国之梦”的向往来展示对未来中国发展和未来社会生活的思考；《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生活的影响》指出抗战时



期的内迁绝不仅限于工厂,而是工业、人口、文化及其他各种现代社会要素包括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内迁,认为内迁是在特殊时期下虽不合常规却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对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发展和进步具有直接的促进意义;《试论 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提出,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上海民间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产生了自己的力量,虽然没有形成如马克思所述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却已经直接反映自己的诉求,并与政治整合力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整合体系和机制,为上海社会发展与生活进步提供了现代活力与自由空间;《上海人人格特征刍议》以上海人人格形成及其特征的分析作为破译上海人密码的一个切入口,论证了人和城市同发展、共塑造之现代特征;《1930 年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状况的一个调查及分析》则剖析了一个个案,根据 30 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对 305 户工人家庭长达数年的完整的生活收入开支数据,从上海工人家庭消费模式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一种现代性趋向,这也正是上海工人阶级向新和与时俱进的核心所在,同时指出具有新旧杂陈的特点,上海工人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外地工人但仍居于上海社会下层,由此造成上海工人队伍与工人运动的多元歧向,产生了率先与滞后现象并存等特征;《从生存本能向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体现的质的飞跃》一文,则分析了 30 年代的上海人的消费与时代、地域的相关性,此时上海人的消费模式发生了“消费革命”的质变,积累已久的消费欲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得消费方式出现了巨变,伴随着永恒的时尚追求,体现出更加自我、更加独立、更加自由的特点,自我价值体现和内在激情的涌动,新的消费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而其廉奢观及其社会大讨论,则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城市社会生活史及其消费观提供了一个借鉴;《社会生活与方言变迁》揭示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城市向现代化轨道演进中,新的上海方言集中反映出新的社会生活,新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上海方言从词汇、语音到语法的迅速变化产生了巨大作用和影响;《人·建筑·空间·文脉》从上海近代以来建筑语汇的变化和空间的差异性着眼,从中折射出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人、上海社会生活与上海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并论证了现代社会生活与建筑的不可分割性;《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的特点与原因》提出 20 世纪 20—30 年代娼妓业的兴盛,既是特殊社会生活条件下的产物,又有着生活自身价值观念的畸变,这些反映了上海社会、经济和生活各领域、各层面的多元势差结构存在;《无奈与抗拒: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分析了民国新一代上海人在享受所创造的新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化成果赋予的恩惠的同时,也不得不咀嚼现代化代价所带来的苦果,这种矛盾体现了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

与缓滞、前进与代价、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交织的两元社会生活结构的巨大势差。

可以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造成的中国社会大变革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大的变革之一。具有责任心的历史学家们多将目光集中到揭示社会变革的原因上来。近代史研究在多个领域发生了突破和巨变,比较突出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的亮点。尤其是“将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社会史研究重心在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从精英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通过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探讨,揭示导致“英雄”辈出的社会内容;二是将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关注与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三是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从而使普通人的历史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能够进一步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历史运动的必然规律和基本趋向。这些突破带来了对习惯于自上而下观察社会的视角的挑战(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忻平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与核心是社会生活,因此,随着当今社会变革的深化及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推进,他将学术目光自觉转移到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研究的最根本层面——社会生活上来了,尤其着重以宏观关照下,注重微观研究,以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为解剖对象,探索上海这座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这是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转换和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宏微关系深入结合的过程,它使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历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重心在于人的社会生活。可以说,从关注现代化大树的成长,到走进社会生活之林去体验和发掘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忻平的史学研究得到了升华和发展。

第四部分是思想、文化和宗教。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忻平就与王韬结下了历史之缘,曾出版专著《王韬评传》。《王韬与〈循环日报〉》一文即为忻平对王韬开创中国报业先河之贡献的品味;《试论黄遵宪的比较民俗文化研究》阐明了黄遵宪民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与特征是比较研究,并发现他在创建中国早期民俗学理论时,是以与日本作为比较的基准,从中演绎出特征、规律及结论;《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从近代史的广阔视野,揭示了日本佛教各教派始终与政府的侵略国策紧紧绑在一起,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对华侵略过程中充当了先锋和始作俑者,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与拓展》以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为典型,揭露了日本佛教各宗派随日本对华军事

侵略而在华开教扩教的侵略色彩。忻平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性,他曾经多次东渡日本深入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京都的东、西本愿寺院考察和查阅资料,写出了史料扎实的文章。

思想、文化和宗教的变迁和影响,与中国近代革命和现代化不可分割,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回首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反思 90 年代以来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等风潮,思想文化及相关领域的课题虽得到充分重视,但从多视角审视王韬、黄遵宪等近代启蒙者的思想、方法和从中日关系考察日本佛教进一步清算日本罪行等课题的开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影响。

第五部分是若干序文。

忻平教授的几篇序文是为他的博士生出版的专著而写的,这些学生尽管研究的题目和方向与其不一,但却深受其学术方向和风格影响,均在自己研究的领域中有很多创见。这些序文同样展示了忻平的学术理路和基本观点。作为治学者之间的心灵交流,从中反映了他对现代化和上海社会史问题的多面相考察,也颇能体现忻平对人生和学术的感悟。另外,从序文不难看出,这些专著虽各有特色,但均体现了扎实性、多层次分类和开阔的视野,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学研究的后继有人。

以上基本总结了忻平教授 30 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开拓的轨迹,在丰富多彩而又枯燥乏味的史学研究世界,忻平依靠其艰苦勤奋的精神,借助其费心搜集的丰富史料,以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又内在地有机整合在一起。他以现代化问题为主线,社会史为方法,以民国史和上海史为时空基点,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为重点,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多层次和多类型的特点,并以此面向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面考察,逐渐显示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此可谓忻平治史为学的主线和重点研究方向。不难发现,其研究成果和中国社会变革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潮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也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史学研究“贵在创新”,本书总体反映了多年来忻平教授对史学孜孜不倦的探索,其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可以说,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毋庸讳言,忻平教授的早期文章还略显稚嫩,后期文章则显得成熟。但我非常欣赏他在编排上对其当年发表的所有原著保持

原样,一字不作改动。这种原生态展示令人不难窥见其学习和研究发展进步的轨迹,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我相信,在当今时代的感召下,学人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必定更为深刻,历史研究必定更为繁荣,我也相信忻平教授在新的起点上,定会不断创新,再接再厉,佳作倍出。是为序。

2009年10月于华东师大临渊斋

——为楼嘉军著《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序	381
近代地域社会群体研究的探索	
——为许顺富著《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序	385
国家与社会：近代苏北区域社会变迁与会政权控制力的考察	
——为李巨霸著《朱来来与孙殿英——1927—1937年苏北地方政权人物研究：一种视角的选择》序	389
——为徐面临江著《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序	夏东元
全息社会史观：一种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3
论王韬的史著及其史学理论	13
治史须重考据 科学人文并重	和文·同空·真象·人
——南加利福尼亚州何炳棣教授访问记	25
时代的变迁与党史研究的拓展	31
808 回顾与展望	808

中国现代化之路

甲午战争：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与加速器	39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48
论孙中山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66
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78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	80
928 ——透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帮会	92
论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阶层的尚武意识	103
民国时期农村现代化之一例：20 世纪 20—30 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	114
论新县制	126
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	149



社会生活史

梦想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的现实观与未来观	167
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生活的影响	185
试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	197
上海人人格特征刍议	
——兼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人多重复合的人际关系	209
1930年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状况的一个调查及分析	221
从生存本能向个性解放与自我价值体现的质的飞跃	
——1930年代上海市民生活消费研究	236
社会生活与方言变迁	
——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方言为例	252
人·建筑·空间·文脉	
——论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建筑文化	272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青楼业兴盛的特点与原因	284
无奈与抗拒：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	293

思想、文化和宗教

王韬与《循环日报》	311
试论黄遵宪的比较民俗文化研究	
——兼论黄氏对中日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	322
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	335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与拓展	359

若干序文

历史研究应重实证性和量化研究

——为楼嘉军著《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序	381
近代地域社会群体研究的探索	
——为许顺富著《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序	385
国家与社会：近代苏北区域社会变迁与地方政权控制力的考察	
——为李巨澜著《失范与重构——1927—1937年苏北地方政权 秩序化研究》序	388
人物研究：一种视角的选择	
——为徐临江著《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序	392
后记	395
“革”的结束给当时的年轻人上大学造就了机会，忻平就是其中之一，一晃30年过去了。忻平在学史30周年之际，选出了30篇论文编成此书，頗有意义。翻阅着厚可盈尺的书稿，我甚感欣慰。作者向我索序，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忻平中学毕业后，正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当时不发展生产力，城市无法容纳新增的劳动人口，因此那个年代的中学生被冠以“知识青年”（简称“知青”的名义统统下乡当农民。作为下乡“知青”，他曾在安徽滁州市来安县农村历练了多年。在农村，他学会了当农民必备的十八般武艺，直面当时中国农村现状，这对他以后学习中国历史是十分有益的。1978年恢复高考后忻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数年后他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我建议他不断开拓感兴趣的新的研究领域。他提出希望以现代化和社会史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我十分支持。三年后，他以优秀成绩通过了博士学位答辩。以其博士论文为主体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一书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一些高校还将此书列为研究生参考教材。 治学上，我一贯提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替心寂寞，不凑热闹”的理念，并强调历史不是单一的，是相互联系的，忻平的认识和我颇为一致。忻平从事史学研究30年来，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即以全息史观为史观，社会史为方法，以现代化为参照，强调近现代历史的整体性和关联性。20世纪90年代忻平相继指导硕博士研究生以来，重视治学与做人的一致性，强调为学须视野开阔、低调扎实、欲治学先做人，在学术上培养学生的全息史观的大视野和社会史方法。这种理念我是赞成的。 忻平教授具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专业兴趣，治学勤奋刻苦。他作博士	

全息社会史观：一种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史学理论与方法

>>>>>>

那样，一字不作改动。这种原生态展示今天学术研究和学习的研究发展进步的轨迹，我以为，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然，在当今时代的感召下，学人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必定更为深刻、更为科学、更为理性，我也相信学术将摆在新的起点上，社会不断创新，再接再厉。

2009年10月于北京

宋式巨匠墨学史